

凌家滩遗址考古发现

揭示古老文化的生动面貌

吴焯 李俊杰

考古中国

核心阅读

从器物考古到聚落考古,再到科技考古、多学科考古,35年14次考古,为我们勾勒出50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的生活图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写下重要篇章。

5月7日,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同一天,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开幕,200余名考古界专家学者齐聚,研讨凌家滩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凌家滩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到融科研、教育与文旅于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离不开考古人持续30多年的努力。14次考古,多位考古人通过手铲一点点为我们揭示出这个古老文化的生动面貌,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写下重要篇章。

1987年6月,一个5000多年前的古老遗址被意外揭开

1985年冬日的一天,安徽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村民在挖掘中发现了许多石器、玉器。当地文化站站长李余和立即报告了文物部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派专家前来调查,并于1987年6月进行了第一次试掘。一个5000多年前的古老遗址就这样被意外揭开。

遇到凌家滩时,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张敬国从事田野考古已有10多年,跑遍了淮河两岸与长江南北。遇到凌家滩后,他的名字便和它绑在了一起。从1987年至2007年的20年间,凌家滩进行了5次考古,张敬国都是领队。

张敬国记得,那时长岗乡还未通汽车,“从太湖山走到长岗乡还有5里路,我们扛着几十斤行李走了两个小时。大家住在乡政府对面的招待所二楼,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在乡政府食堂搭伙。乡政府距考古工地也是5里路,每天来回4趟,一天要跑20里。”

第一次发掘面积其实只有两个探方,50平方米。但由于文化层较浅,揭去耕土层和很薄的汉代堆积后,很快便发现了早期墓葬。后来命名为87M1的墓葬中,首先发现了3件国宝级文物“站姿玉人”。见过这3件玉人的考古学家王仁湘忍不住写诗表达心中的喜悦:“问你知,是谁?方方颐,弯弯眉;平平冠,腰紧围;手扞心,目睽睽;端端立,衣如水……”

玉人以浅浮雕技法制成,体态比例匀称,是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体玉

雕。玉人身上的冠帽、装饰,表明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懂得仪表美。祈祷的姿势,表明当时已有远古崇拜活动。随葬玉人是一种代表身份地位的高等级礼制,说明那时的聚落已经有一定的礼仪。它体现的技术和审美,改变了大家对巢湖流域5000多年前古人生活的认知。

接下来,三角形刻纹玉片、精致的玉弓等出土玉器让人应接不暇,当然,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其他遗址从未见过的刻纹玉版和玉龟。当时玉版只露出一半,另一半夹在玉龟下面,玉龟分成了上下腹甲,腹甲做得非常逼真,在上下腹甲之间有几个孔,应该可以用绳子拴上。玉版两面均抛光,正面刻纹,中部一小圆,内琢刻八角形纹,小圆外琢磨一大圆,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平分分为8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各有一条圭状纹饰。“这是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古人的精神世界就这样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可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张敬国说,“直到今天,对玉版和玉龟的讨论还在进行着。”

这次考古结束后,在当地举办了3天的小型成果展,让当地村民和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一饱眼福”。还有人专门从合肥赶来,凌家滩从未那么热闹过。

1998年重启的凌家滩第三次考古,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次考古收获巨大,探明了以凌家滩遗址为中心、半径约2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处大型墓地。尤其是在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发现祭坛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一个布局完整的史前文化遗址日渐清晰。

5次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祭坛1座,墓葬68座,出土玉器和玉料1100余件……这是很多考古人梦寐以求的骄傲。“凌家滩玉器、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这些特殊玉器群的出现与广为流行,并非偶然,它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张敬国说。

从2009年开始,凌家滩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吴卫红从1998年开始和张敬国一起在凌家滩考古,对2000年和2007年的两次考古如数家珍。“前5次考古成果可以说是耀眼的红花,但还需要更多绿叶来支撑。考古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带来更多未解之谜,比如凌家滩人的衣食住行如何?这里和周边是什么关系,是一枝独秀还是众星捧月?如何构建一个区域的社会图景?陶器分期、年代、环境的分析缺一不可。我们需要了解遗物与遗迹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动因。”

从2008年开始,吴卫红成为第二任领队,在凌家滩实践了从器物到聚落的考古方式的转变。他用“不精彩、很基础、很扎实”来形容自己2008年到2017年这十年的工作。“先是方圆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至二三十平方公里,遗址的主要分布范围用5米间距进行广泛钻探,外围文化堆积稀疏区为10米间距,更外围是20米间距。只有进行全面调查,才能发现以前没有的线索。”

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踏实的办法,术语称之为“不留空白式”区域调查。这种调查需要充足的人手。于是,吴卫红在网上“广发英雄帖”,公开招募志同道合的考古人,主要是各高校考古专业的学生。如今,这也成为业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方式。“每次10个人左右,持续进行了8次区域系统调查,基本摸清了这个



区域的聚落遗址分布和考古文化分布,知道了凌家滩文化不是无源之水,它与同处长三角地区的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一脉相承,也知道了它对良渚文明的影响。”

2008年至2013年的考古卓有成效。对凌家滩及周边400余平方公里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发现近20处小型聚落,年代大多略早于凌家滩,反映出明显的聚落集中趋势。在此基础上对凌家滩及周边10个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勘探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发现了内外两重环境,在岗地东侧的石头圩发现大面积生活区。

从2009年开始,凌家滩作为区域核心性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在含山县召开的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正式命名了“凌家滩文化”,考古界专家们形成共识:凌家滩文化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吴卫红感叹:“这样的断语来之不易!”

2018年后,吴卫红离开考古一线,成为安徽大学的老师,可以向更多学生传道授业。刚刚出版的《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就是他的思考结晶。

用更多科技手段,对关键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2020年,凌家滩被纳入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再次启动,36岁的张小雷成为第三任领队。经过连续3年的考古,又有了许多新发现,尤其是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初步证实为大型公共建筑。前不久,凌家滩考古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今,凌家滩遗址考古工作站的条件大为改观。当地政府将原有的5栋大粮仓进行整修再利用,从宿舍到工作区、到公园的相关展陈区,步行只要几分钟。考古工作站内,张小雷及其团队正忙碌着。拍照、修复、绘图……十多名工作人员有条不紊。

出工作站,我们跟随张小雷来到了墓葬祭祀区西侧广场。现场搭建的大棚中是一个祭祀

坑。“这里出土了各类遗物260余件,包括石器、玉器、陶器。石器多残碎,但多数可以拼合,并有少量完整器。器形以石钺为主,另有少量石铈。这些石器大多被烧过,器体多已白化,部分被烧变形。这为我们复原当时的祭祀场景提供了资料。”

在张小雷看来,前两任领队的工作为凌家滩考古奠定了无比扎实的基础,他的任务就是通过更多科技手段、更多学科合作,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为凌家滩的未解之谜找到答案。环境考古显示,聚落变迁可能与巢湖流域的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有关。通过对玉料、石料、玉石器制作技术的检测分析,对当时的手工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有了进一步了解。通过研究,首次确证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刷新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组织管理程度的认知。

唐军是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的“元老”,前不久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联席会议上获得“杰出贡献人物奖”。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他最为欣慰,“原来占压遗址本体的5个自然村、约1000户村民顺利完成了搬迁,考古工作者可以在公园内安心进行主动性发掘了。”

商合杭高铁的含山南站,已经被来当地旅游的人习惯性地称为“凌家滩站”,它距离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只有两公里多,十分方便。我们在公园里碰到的一批游客,刚看完杭州的良渚遗址,又来到凌家滩:“古人的选址真科学,北望太湖山,近处裕溪河连接着巢湖与长江,四周低洼,先民们就在中间稍高的岗地上生活、生产。”

多位考古学家的努力,已经为我们勾勒出50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的生活图景:人们在这里种稻,兼及养殖、渔猎和采集,同时从事玉石器、陶器、纺织等手工业生产,高超的制玉技术深刻影响了周边聚落。宗教活动在中心的大型祭坛举办,内外两条环壕堪称大型水利工程,护卫着一方平安……

图①:凌家滩目前发现最大的宽体玉璜。

图②:凌家滩发掘出土的陶器。

图③:凌家滩发掘出土的玉人。

以上图片均为吴焯、李俊杰提供

图④: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航拍。

胡成超摄影 版式设计:赵偲汝

西汉金石文字遗世无多,瓦当文字却字大而道美、量多而变化无穷。

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屋檐上筒瓦头下垂的部分。它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至西周已非常成熟。战国时期,瓦当艺术得到发展。到了汉代,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与艺术性上都进入鼎盛时期,并出现了瓦当中重要的一类——文字瓦当。

文字瓦当出现最晚,人们对它的兴趣却最浓。宋人率先注意到文字瓦当,留下记载,而对无字的图像类瓦当不著一字。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初。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面展开后,对文字瓦当的研究更加全面。

考古发掘表明,文字瓦当可能出于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57—前141年),西汉中晚期是发展高峰。

根据文字内容,文字瓦当可分为官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吉语等七大类。从现有资料看,文字瓦当约有400种不同的文字内容,其中吉语约占半数。在存世的文字瓦当实物中,不同版别的吉语瓦当更占了绝大多数。

西汉文字瓦当的直径多在15—18.5厘米之间,小者如“佐戈”瓦当,直径仅13厘米,大者如“益延寿”瓦当,直径可达22厘米。

西汉文字的篆法线条在刚柔、曲直、疏密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和谐。西汉金石文字遗世无多,瓦当文字却字大而道美、量多而变化无穷。东汉以后,瓦当艺术衰落,文字瓦当也渐次式微。

秦汉的篆书、隶书以对称平衡为主要结字原则,整齐规矩,书于碑石、铜器,莫不合宜。这种方块文字应用于瓦当,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瓦当的外形是圆形,个别为半圆形。以西汉文字瓦当中最常见的四字瓦当为例,早期瓦心基本为突起的球面,个别呈柱状或饼状,其外施弦纹(圆形隔线),后来出现双隔线中再饰珠纹。瓦心隔线与外轮隔线间形成4个扇形区域,于是,打破对称、因形而化,成为瓦当文字的必由之路。

书写着“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的十二字瓦当,是最著名的瓦当之一。十二字瓦当字数较多,又十分稀少,很受金石学家重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学家在汉长安城武库遗址的西汉中期地层发掘出土了这种瓦当,为其时代问题提供了科学证据。十二字瓦当文字内容多源自《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其出土地点也十分符合儒家思想。汉代儒生在解释“武”字时说“止戈为武”,那么把祈愿国家万世长久、天下安宁的文字瓦当置于国家武器库的房檐上,不是十分合适吗?

西汉书法处在由小篆向隶书转化之时,是旧制已破、新法未立的艺术转型期,这造就了人们欣赏不同书体时的宽容心态,更为西汉书法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空间。更加夸张的笔画屈伸、挪让、穿插、增减,成为当时营构装饰性瓦当文字字形的利器。方圆有机组合、曲直因形展开,形成了全新而极富个性的形式。汉代人在非圆非方的瓦当上改造方块字所展现的飞扬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

瓦当表面形态造就了瓦当文字奇异的结字和章法。而由文人设计书写,再由工匠篆刻于瓦范,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和书法载体,也影响了瓦当文字,形成或曲劲、或圆浑、或古朴的特点。正是这些特征,成就了西汉文字瓦当之美。

(作者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发现汉代文字瓦当之美

陈根远



▲“与天久长”西汉瓦当。

▲“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当。

以上图片均为陈根远提供

药材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

孙业红 焦雯珺

在众多农业文化遗产类型中,药材是既普遍又特殊的一类。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都能见到药材的身影。我国有悠久的药材种植和使用历史,此类遗产资源更为丰富。

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纯药材类项目有6项,分别是辽宁宽甸柱参传统栽培系统、重庆石柱黄连生产系统、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湖南龙山油桐种植系统、云南文山三七种植系统以及吉林和龙林下参一芝抚育系统。此外,我国还有50余项药食同源类项目,涉及枸杞、杏仁、桑叶、麦芽、葛根、姜等数十种作物。如果加上一些

待申报的项目或省级项目,这个数量还会更加庞大,如浙江武义的灵芝—铁皮石斛栽培系统、浙江东阳的元胡种植系统……它们都是巨大的宝库。

近年来,传统药材作为重要的医药科学资源,受到普遍关注。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屠呦呦院士带领团队从传统药材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并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在全球的受益者累计多达数十亿人。用青蒿素类复方药加服小剂量的伯氨喹治疗病人以阻止疟疾传播的技术,目前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和推荐。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传统中药材对现代药学

的贡献。

对三七的研发制药也是一个成功案例。三七别名山漆、田七,是驰名中外的名贵中药材。据推断,其使用历史已有3000余年。有资料记载,云南名医曲焕章创制出了白药,其主要成分就是野生三七。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从三七中发现一种具有止血性能的氨基酸,命名为三七素,后来广泛应用于现代制药。

党参是一种桔梗科植物,得名于山西上党,即今天的长治市。《范子计然》中提到“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石勒别传》有“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的记载,说明“上党人参”或许已有16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生长

在长治市壶关县紫团山参源沟的紫团参,自古就是医家处方上的重要药材。也有专家认为,当时的“上党人参与如今的党参并不相同。目前,壶关党参栽培系统正在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除了生产药食同源产品,药材类农业文化遗产还能营造康养环境,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并有机会产生更大影响,成为继茶文化、稻作文化等之后传播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媒介。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民健康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对药材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